

教育职业化趋势中的传统与传承：一项关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的个案研究

摘要：处于转型期中国的大学，在社会发生剧烈变革、“断裂”成为基本特征的背景下，在研究和发表日益成为大学主要行为特征而各个专业系科分工成为主要结构特征的前提下，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张力，即如何在日常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中实现教育在传统上的基本功能——并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和从事研究而是要实现“教以成人”这一东西方传统教育的核心要求，这也是现代早期西方学院的主要诉求。通过对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所代表的中国社会学传统的梳理，本文发现，传统意义上“为己”的社会关怀与责任感，对于经典的传承与相应的教育、扎实的社会调查、兼容并包的治学态度和文化自觉的意识，是将研究、教育和育人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且回应上述问题与焦虑的途径。

在近期关于中国大学改革之道的讨论中，关于“人”本身的教育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这一问题的提出与强调既有学理上的进展，也有具体的背景。这一具体背景是，研究与发表日益成为大学和学术活动的主要行为特征，而职业化的学术活动与传统对于“教育”的理解之间存在着张力。这一张力在近年愈发明显，也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渠敬东通过回顾本科教育和现代教育理念兴起的历史指出，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大学本科教育的问题从来都不仅仅是教育的议题本身，而是“整个现代社会确立典范和秩序的着眼点，也是塑造人的最高理想形态的出发点”，与延续文明传统中“人是什么”的提问息息相关（渠敬东，2017：29）。然而在现代大学，这一教育的原初诉求逐渐被遮蔽和遗忘。要恢复这一“教以成人”的要求，同时实现无论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还是现代教育理念的实践这一类目标，必须将“基于经典文本的人文教育”与对于现实经验和人的生活自身的体察与反省结合在一起，即将“经典研究”与“经验研究”结合在一起（渠敬东，2017：29）。

李猛通过梳理美国研究型大学兴起的过程和所遇到的挑战，明确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研究型大学在教育方面的基本困境，他同时发现，这一挑战“推动了大学第二轮改革中重建学院的努力，力图通过学院通识教育的探索，克服研究型大学中本科教育面临的困境”（李猛，2017:8）。在文中，李猛不无所指地提问说：“对于一个新兴国家的大学来说，教育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仍然是，教育是否只是生产孤独的学者？什么样的知识，如何才能不仅造就具有专业技能的职业人，还能造就真正扎根生活、理解这个世界的人与公民？”（李猛，2017：191）。

这一提问对于中国的大学来说具有现实意义。今天的研究型大学所面对的传统问题，即教以成人的教育功能，本来是由传统学院所承担的，以专业研究为主的研究型大学如何承担此种教育功能，同样是中国现代大学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将此问题置于当今中国的背景下，会看到尤为复杂的面向。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传统的国家来说，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虽然建立的时间并不久远，然而却也依寓中国文化的历史与传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与传统，并在“育人”方面有着十分具体的经验。在这方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个案或许可以成为一个理解的切入点。

笔者在 1998 年与北大结缘，迄今已有 20 年。回想起来，这 20 年过得平凡普通，确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唯一值得欣慰的，是 20 年来始终能够坚守自己做学问的理想和生活，这当然是最为珍贵和难得的。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理想和生活并不完全是自己选择和坚持的结果，而是受惠于北大才得以成全的缘分。在入燕园之前，笔者已经通过各种媒体对于百周年的北大和北大的文化有一些了解，并且也很清楚自己有着做学问的兴趣和志向，不过在初入燕园之时，对于学问却并无什么见识和了解。笔者求学于社会学系，然而开放包容的北大带给青年学生的是更为广阔的视野和缘分。这一缘分主要与两位老师直接有关，一位是社会学系的杨善华老师，一位是哲学系的王炜老师。

由此，本文聚焦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及其所代表的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与传统，通过对其中几个特质的思考，帮助我们理解传统的“传承”之重要性。

一、“为己”的社会关怀与责任感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传统之中，费孝通先生和雷洁琼先生是两位极为特殊的人物，他们不仅在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过程中居功至伟，也是北大社会学系在传统和文化方面极为重要的奠基者，是后辈学者“仰之弥高”的大师。他们所开创的传统和文化，如春风化雨般浸润在社会学系的日常教学和研究实践之中，成为北大社会学系的研究传统在许多方面的底蕴。在这其中，最为重要的首先还是对于国家与社会那种强烈的关怀与责任感。笔者认为，这是北大社会学系所有传统的根本，是费先生和雷先生留给北大社会学系最可宝贵的财富。他们所代表的老一代社会学家那种将自己的研究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传统、“从实求知”的严谨学风和“志在富民”的朴素理想，几乎成为了北大社会学系数代学人生生不息的信念。

这种传统源远流长。在 1930 年代，“救亡图存”成为几乎所有爱国知识分子的核心关怀，成为社会的一种主要思潮。费先生和雷先生也不例外。雷先生曾回忆说，她出国读书的直接原因是立志“将个人奋发读书和挽救祖国与人民两者结合起来”（杨善华，2011），立志“探求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学成回国，报效祖国”（雷洁琼，2004:5）。费先生 1933 年正式开始学术写作之前，也已经清晰表达出同样的关怀，即寻找中国出路的志向（孙飞宇，2017a）。到后来，费先生的《江村经济》之所以受到了马林诺夫斯基如此高的赞誉，也是因为他在江村调查中抓住了这一关键点，他注意到江村这个小小的村落所代表的更大的问题：“他的伟大祖国，进退维谷，是西方化还是灭亡？”（马林诺夫斯基，2013:7）

这种关怀贯穿于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毕生。1999 年，费先生在纪念曾昭抡先生诞辰 100 周年的文章中写道，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要有“志”。这个“志”，在他们那代知识分子看来，就是爱国。有了共同的“志”，不同代

际、不同学科的知识分子就能够对话、沟通和交流。他通过对比，对当年轻的知识分子有所批评，认为今天许多年轻人缺少了这个东西。他说：“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一生要做什么事情，他自己要知道要明白……我觉得‘志’是以前的知识分子比较关键的一个东西……没有这样的人在那里拼命，一个学科是不可能出来的。”（费孝通，2009a: 420—421）

就社会学而言，在纪念潘光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中，费先生以潘光旦先生为例明确说，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这种关怀不是假大空的，而是要从自己切身做起的，是“推己及人、一以贯之”的。这一点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费先生在晚年一再强调这一点，就是担心这种“为国为民”的情怀随着时间流逝和代际更迭而逐渐式微。如果没有这一点，所有具体的传统就失去了根基，成为空话。

二、经典理论与道德教育

北大社会学系对于理论研究十分重视，回归经典堪称北大社会学系在学风上带给学生的第一训练。周飞舟在对于费孝通先生的研究中发现，费先生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从看重实践转变为实践与理论并重”（周飞舟，2017）。而且出于上述情怀和传统，在北大社会学系，老师们对于社会学经典与广泛意义上的人文经典都有着普遍的敬畏之心。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北大社会学系的学生们受到了超越于社会学领域的阅读训练。这一训练并不仅仅是出于知识或者研究上的考虑，而是有着道德教育的意味。

北大社会学系的理论教学通常是在大一下学期和大二上学期的“国外社会学学说”这门两个学期的课上。在笔者求学时，这门课程是由杨善华老师教授的。在这门课程上，笔者首次见识到社会学理论的魅力，而两个学期的课程堪称在社会学理论方面和在学问方面的启蒙。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杨老师还讲授了“家庭社会学”、“城乡社会学”等课程，这些课程也都充满了对于理论的重视。在杨老师的身上，笔者能够慢慢体会到学问和大学教育的样子是什么。

这种对于理论的重视并非个案。在《巨人与侏儒》一书中，芝加哥大学教授布鲁姆大声疾呼，西方曾经的学院教育“致力于将信念的标准和深度教给年轻人……提供了兼具包容性和严肃性的模式”（布鲁姆，2003:315）；今天的大学做不到这一点，其教学越来越肤浅，其中即便有开放性的内容，这种开放性也是“为后来的漠不关心准备的，因为年轻人对深刻的东西很少有深切认识的经验”（布鲁姆，2003:315—316）。然而文明的遗产是通过伟大书籍一代又一代传递下去的，各种眼花缭乱的时髦课程并不能教给年轻人真正重要的问题与严肃的思考，也不能为实现道德教育提供切实的基础。北大社会学系的老师们对于这一状况有着深刻的洞察，所以在专业领域内鼓励对经典的细致阅读与思考。

这一教育的目的当然是“为己”。社会学系要求学生精读文本，结合自身经验理解经典，进入经典。思考和理解经典的问题是如何被提出和讨论的，理解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由来，同时逐渐学会从反思自身之前“视为理所当然”的那些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尝试“自我陌生化”，然后再“认识”自己。与此同时，通过阐明问题、思想范畴和分析工具的生成过程，理解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成长过程，思考社会学是什么和社会学何为这样的问题。在这样的阅读过程中，学生们逐渐体会到，在大学最值得学习和反思的不仅仅是具体的理论命题，也不仅仅是时代的重大议题及其解决方案，还有个体生命历程、终极关怀、学术传统与时事议题之间的关联方式。社会学的经典作品尤其适宜于此种工作，因为在涂尔干和韦伯那里，社会学的创立都与人的道德处境以及相应的行为方式息息相关。也正是通过对经典的精读、慢读、细读，通过习得一种朴素的阅读方式，学会以朴素敬畏之心和切身经验面对经典，来实现道德教育的首要目的，即学会真正地敬畏生活和反思生活。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学生们逐渐理解到，提出问题比给出答案更重要；也逐渐体会到，社会理论不能离开经验研究而独立存在，经典研究亦非高高在上的虚无缥缈之物，而是与每个个体的切身生活和思考都息息相关之事。诸如文明对话、理论思考等等大问题，也不是只有理论家才考虑的主题，而是针对每一个普通人的提问：不仅要问我们正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而且要问什么样的生活

才值得我们去追求？学习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同时，就是理解自身当下的生活、社会和文化。

在北大社会学系，这样的学习从来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学领域。在涂尔干那里，社会学的最初目的是以科学的方法实现道德关怀。所以举凡能够实现此一目的的典籍都不会被拒绝。无论经典三大家还是不同学术传统中的经典，乃至现代理论的新传统，都被视为社会学所传承的西学基本问题观之“认识你自己”的思想资源。这一为己的传统切实地扎根在系文化之中。在北大社会学系，流传着一段著名的话：

本书的题目（即《巨人与侏儒》）并不特别与一个老说法相关：“我们都是矮子，但是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谦卑的姿态，表达了太多的自我满足。巨人是那么容易让我们爬上去的吗？巨人的功能就是把侏儒扛上他们的肩膀吗？或许他们曾经是亲切和蔼的，但是现在他们却把我们摔在了地下，偷偷走了，只留给我们一个视界更宽一些的幻觉。毫无理由地假设我们和伟大者的亲密关系，很快就会使年轻一代人否认有什么巨人，并断定这整个说法不过是一个谎言，是由教师们编造来抬高自己的。我想，巨人会鄙视这小小的喜剧和玩笑。（布鲁姆，2003）

三、从实求知的社会调查

笔者曾撰文通过对于中国社会学早期发展历程的总结提出：“中国社会学在最初就莫立了极其明确的基于传统而放眼世界文明视野的气度，和兼容并包又扎根现实、尊重经验的特征。”（孙飞宇，2017b：58）在这一背景下，社会调研自然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最为重要的研究传统。前述费先生和雷先生带给我们的“从实求知”的严谨学风，要牢牢基于这一特征才得以成立。

对于社会学系的老师们来说，社会调研这种社会研究的方式像读书一样，是毕生不可或缺的功课。费先生早年参与中国社会调研的种种故事，早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1999年，时年已经89岁的费先生

还说：“1998年这一年比较重要，是我一生中的一个段落，因为这一年我把所有的公职都辞掉了，这样我可以专心做一件事情了，就是做我心里边要做的事情并把它做完。”（费孝通，2009a: 340）这件事情是什么呢？费先生从1980年开始回顾，认为从1980年开始，他获得了学术上的“第二次生命”，此后一直在“行行重行行”的，就是毕生都念兹在兹的“志在富民”这件事情，也是他想要做且要做完的（费孝通，2009a: 340）。

为了这一信念，他说他自己在“去年一年里……重要的是出门166天，收获不小，又有提高”（费孝通，2009a: 343）。所谓“又有提高”，指的是他自己在勤奋的社会调查之中，真正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关键是不死读书、读死书，要把学到的各种知识联系起来，用到实际工作中”（费孝通，2009a: 343）。这一点是社会学研究的根本。费先生在文中说，他希望能够继续从事社会调研，因为“行行重行行”是毕生的志愿，“我虽然老了，但是还到各地走，希望还能继续走下去”（费孝通，2009a: 343）。

在2000年的时候，费先生在其长篇的《补课札记》中，还深情回忆帕克带给中国社会学最为重要的影响，就是深入实地的社会调研（费孝通，2009b: 7—108）。这种社会调研的风气与传统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并非空话，而是深刻地印在了社会学系的研究取向中。尽管笔者从事的是社会理论的研究和教学，然而却在课堂上一再向同学们展示帕克如下的这段话：

去坐在豪华旅馆的大堂里，也坐在廉价客店的门阶上；坐在高级住宅的沙发里，也坐在贫民棚屋的地铺上；坐在庄严堂皇的大音乐厅里，也坐在粗俗下流的小歌舞厅中。简单说吧，去做实际研究，把你裤子的屁股弄脏！（Bulmer, 1984: 97）

对于许多老师来说，社会调研不仅仅是研究阶段的资料搜集工作，而是与教育息息相关的过程。杨善华老师曾经明确提出过，对于大学与大学教育来说，“虽然课堂是教学活动的主要场合，实际上对一个教师（当然也包括大学教

师)来说,教师和学生的互动不应只局限在课堂上,还可以在课外利用各种形式进行教学”(杨善华,2009:183)。任何形式的大学教育目标都应该是同样的,从大的方面来说,是教以成人;而具体说来,则是“把目标锁定在学生能力的培养与提高上”(杨善华,2009:183)。这里的“学生能力”,当然既包括教化意义上的“成人”,也包括各种思考、科研和做事情的能力。这两个方面互为一体,不可分离,前者是后者的根本,后者是前者的具体呈现。

所以笔者在北大求学期间所受的另外一个主要训练,就是来自杨老师的田野调研。杨老师是笔者的导师,很难表达这些年来他对我的帮助、关心和鼓励。虽然笔者从事理论方面的学习,但是杨老师要求笔者和所有其他从事理论学习的同学一样,必须接受社会学田野调研的训练。如上所述,社会调查是北大社会学传统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是费先生和雷先生等老一代学人留给北大社会学系的宝贵遗产。作为雷先生亲传弟子的杨老师,更是毕生都在兢兢业业地践行着这一传统。几十年来,杨老师的调研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带着学生们去过许多地方,走了许多路,见识了許多人。在调研中,每天晚上,杨老师都会带学生讨论当天的访谈,逐个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教给学生如何访谈,如何理解个案,如何提出研究问题。几乎每一天,讨论会都要持续到凌晨。这其中有许多调研地点,杨老师更是坚持长年多次回访和持续性调研。例如在河北的西水碾村,杨老师坚持了20年进行跟踪调研和访谈,与村庄中几代人都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西水碾村的典型人物、故事和社会结构已经成为师门里耳熟能详的共同知识。正是在杨老师这里,学生们逐渐体会到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独特魅力,就在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学会了如何理解他人,如何理解社会,如何从事学问,同时也是如何理解自己和如何与人相处。这是一门真正意义上知行合一的学问,是一门不仅在书斋里读书、而且要迈开脚步去走路的学问。这门学问的魅力和切身之处不仅仅在于对中国社会的深入理解,还在于社会责任的主动担当与由此而生发的自我塑造。杨老师今年已经整整七十岁了,依然勤奋地从事社会调查和研究工作。以2018年为例,他几乎每个月都有至少一次调研的计划。调研的地点从河北到广西,从浙江到乌鲁木齐。这样的工作强度对于一个三十几岁

的年轻人来说，都太大了，然而他乐此不疲，真正做到了费先生所说的“行行重行行，碌碌未敢休”，甚至是“皓首未敢移”。

在 2015 年社会学系的毕业典礼上，笔者曾对学生们说：“我所体味到的社会学，是一种修行的学问。”这样的体会既来自阅读，也来自跟随杨老师所做的这些田野调研活动。

四、兼容并包的治学态度

2002 年，笔者留在社会学系读研，有幸忝列杨老师的门墙。记得十分清楚，笔者在找杨老师谈话、希望跟随他做理论研究的时候，表达了自己的忧虑：认为自己的资质不够好，见识不够广，在学问上的启蒙也比较晚，所以对于从事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并没有什么信心。听完了笔者的话，杨老师说：“学问就好像汪洋大海一样，是没有尽头的。没有谁敢说自己能够穷尽学问，所以关键在于，对学术保持敬畏之心，保持谦逊、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在得知了笔者的兴趣在于现象学社会学之后，杨老师欣然说：“我对于现象学是听不懂的，但是没有关系，我认识懂的人，我把你介绍给他，你可以跟他去读书。”他随即将笔者引荐给哲学系的张祥龙老师。这是笔者真正接触现象学的开始。在几年之后，笔者才知道，这种毫无门户之见、以学生的兴趣为出发点为学生考虑的胸怀和对于经典理论的敬畏之心，其实是非常难得的。杨老师非常谦虚，他并非不懂，而且同时也在阅读和研究现象学社会学，并且在随后几年的时间里发表了多篇这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包括带着笔者一起发表的《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这篇论文。一位教授对于学生的兴趣和研究方向充满了好奇，愿意自己也一同尝试，这可能是在真正的意义上实践前述社会理论和道德教育的关怀吧。

笔者在杨老师毫无门户之见地被推荐给哲学系的老师之后，开始同时在哲学系和社会学系上课和学习。除了张老师的课，笔者还选了王伟老师关于海德格尔的课程，并结识了王老师。熟悉北大外哲所历史的人都知道王老师在其中的位置和故事。王老师的专业领域是存在主义现象学。他身上有着浓厚

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范，他创办的“风入松书店”一度成为北京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栖居之地。他的课程基于海德格尔的文本，以精读的方式进行，往往一个学期下来才读了十几页。在这样的课程上，笔者在思考能力和文本阅读方面都受到了进一步的训练。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两个系里几年的学习让我体会到，兼容并包的态度和对于学术的敬畏态度一体两面，不可或缺。如果对于学术没有敬畏态度，也不可能有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度；反过来说，只有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度，才是对于学术之敬畏的最好体现。

这种兼容并包的治学态度既来自各个方面，也体现在各个方面。杨老师在田野调研方面的训练，王炜老师在现象学方面的训练，使笔者不仅加深了对于中国社会的理解，更由此出发，对于社会学研究中“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学术态度和议题有了切身的体会，并因此对于社会理论资源有着更为切实和朴素的开放态度。而两位老师在这方面的努力和期待，更使得笔者后来可以在多伦多约克大学的“社会与政治思想”这个项目中成为随约翰·奥尼尔读书的最后一位博士生，研读弗洛伊德的经典著作。

不过，就中国社会学研究而言，这种态度不仅仅体现在理论或调研的工作中。2003年，费先生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开篇就指出了社会学这门学科的丰富性：“社会学是一种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社会学的科学性，使得它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可以‘用’来解决具体的问题……然而，社会学的价值，还不仅仅在于这种‘工具性’。”（费孝通，2009b：438）在这篇文章中，费先生认为，社会学研究的人文性要求社会学去研究一些“基本问题”，“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费孝通，2009b：439），而不能仅仅局限于科学的部分。费先生提出，中国的社会学建设应该“真正开辟一个研究精神世界的领域”（费孝通，2009b：444），应该重视文化遗产，“深入挖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遗产”（费孝通，2009b：439），应该去探索更多“空白的领域”，例如在人际关系中那些“不言而喻”、“意在言外”的“意会”的领域，应该对于“人”和“人心”本身有认识。

费先生说的当然不是要仅仅局限在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事实上，费先生几乎是国内最早认真阅读和介绍西方社会学经典理论的人。在“魁阁”时期，他就写过关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长篇读书笔记——“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费先生除了对于韦伯的这部经典著作有实质性的阅读、梳理和介绍外，还将韦伯置于其本身的学术传统和时代氛围中去理解，非常清晰地梳理了从马克思、韦伯、桑巴特（Werner Sombart）到托尼关于资本主义的思考。在这篇文章中，费先生希望思考的真正问题是，通过对于韦伯所描述的这一“他者”的认识，讨论中国与现代社会、中国与资本主义的真正可能性关系是什么，也就是说，试图从一个侧面思考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究竟何在。

不仅如此，这种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度还应该体现在方法论的层面上。中国当前主流的社会学研究基本上采用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这里所说的科学，主要是指“借鉴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假设检验和统计等基本研究方法”。针对这种状况，费先生肯定说，“这些方法作为社会学基本的研究方法，已经基本成熟，未来也将长期作为社会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但是社会学不能局限于此：“另一方面，我们在探讨某些新的论题和领域的时候，也需要进行方法论和方法上的再探索”（费孝通，2009b：461）。此类探索的资源如何寻求呢？费先生说，从人类的各种文明、各种文化中去探求，所以“我们应该以一种开阔的心态”面对社会学的发展（费孝通，2009b：461）。费先生在这方面视野极为开阔，他指出，我们应该对于人类文明中各种优秀的成就加以借鉴引用，而不拘于古今中西。他说：

一方面，我们做到真正“领悟”古人“格物致知、诚心正义”的认知方法，明白它的真谛；另一方面，吸收当前国际上各种思想潮流，不拘泥于是否时髦、流行，而是注重于对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价值，以我们自己的需要为参照系来衡量和吸收。比如，在西方社会学田野调查中就出现了基于神学中“解释”（hermeneutik）、马克斯·韦伯的“理解”（verstehen）、“现象学”（phenomenology）等学术传统而发展出来的“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

的方法论思潮，就是一种侧重调查者和被调查者这两方面主体意识的调查方法的探索，与一般科学实证的方法论有所区别……这些东西，似乎与我们的“将心比心”、“心心相印”的理念有某些相通之处，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和研究。（费孝通，2009b：464）

费先生说，今天社会学的研究只有达到上述这个层面，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学”，才能称之为“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跃进”（费孝通，2009b：465）。费先生以黄钟大吕般的气魄说，这不仅仅是社会学本身的事情，而是更为重要的一国一文明的“文化自觉”的事情。

五、文化自觉与社会学中国化

1997年，费孝通先生在“开创学术新风气”的讲话里说，研究的新风气，在北京大学来说，应该是“文化自觉”。他解释道：“我想当前的新风气就是文化自觉，各民族开始要求自己认识自己的文化，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怎样发展下去？人文科学负有答复这一系列问题的重大责任。”（费孝通，2009a:1—2）这样的风气应该由北大始，因为“在中国开创学术风气，北大一直是带头的”（费孝通，2009a:2）。

费先生认为，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之所以称他的《江村经济》为人类学发展中的“里程碑”，就是因为认识到书中的“本土研究”所蕴藏的文化自觉的种子（费孝通，2009a:2）。这一点不仅仅是他毕生工作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马林诺夫斯基等西方世界的学者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得以有生命力和有价值的根本原因所在。费先生说，尽管作为文化自觉之具体表现的“社会学中国化”由吴文藻先生提出，然而，他在青年求学时期的外国老师们，包括芝加哥大学学派的奠基人帕克（R. Park）和英国人类学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拉德克里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都鼓励年轻学生从事具体的社会实地调查，以求真正了解中国社会。这里的文化自觉并非是说要“复旧”，而是说，“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

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但同时也不主张‘西化’或‘全面他化’”（费孝通，2009a: 5）。

费先生晚年对于“文化自觉”极为重视，认为这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同时需要针对“自身”与“他者”都有特别深刻的认识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吸收”的过程。这一期待不仅是针对中国的，还是他对于世界发展的长远展望。他说，只有等到“各种文化都自觉之后，这个文化多元的世界才能在相互融合中出现一个具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形成一套各种文化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同守则”（费孝通，2009a:6），才能实现他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2009a: 6）的愿景。

文化自觉在北大社会学系不仅仅是一个议题，更是通过许多老师的研究与教学一点一点“做”出来的。而“做法”当然包括上述四个方面。除了作为根本的“为己之学”的态度，若不以敬畏之心面对经典和精读经典作为道德教育的第一步，则无从谈起基本的思考；若无从实求知的社会调查，没有对于中国社会、传统与文化的深刻理解，则文化自觉必定为空谈，因为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基本范式和理论框架，都来自西方，必须在问题意识上牢牢扎根于中国本土的经验；同样，如费先生所说，若无兼容并包的治学态度，没有对于“他者”的体察、借鉴与融合，则社会学中国化的主体性必然不足，因为今天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现代性问题，同样是有普遍意义的。所以，中国的社会学要获得长足的发展，就不能仅仅依靠西方的理论资源和研究范式，因为如前所述，中国社会学的起源、传统和所依靠的具体社会与传统完全不同。然而正如费先生所言，这并不意味着狭隘盲目的闭门造车。因为在“为己”的前提下，如何面对西方学术资源的问题不仅是是否受西方影响的问题，而且同时既是如何理解进而研究西方的问题，也是如何认识和理解自身的问题。中国社会学界对于西方一系列经典理论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自杀论》等等的阅读、理解和吸收，其出发点、理解框架、问题意识和理论期待都与西方学界当今的主流不一致。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国内学术界的落后。所以说，“社会学中国化不是说只研究中国而固步自封，在中西问题域中去努力建设

中国主体性，也并非说不要去理会西方理论。研究西学以丰富自身的精神世界和增进自我理解为目的”（孙飞宇，2017:60）。

六、学术、教育与育人

如前所述，在今天专业化、职业化研究的趋势中，传统的学术风气和文化如何延续，是中国现代大学所面临的普遍问题。今天中国大学教育中许多普遍的焦虑都与此有关：如何在现代专业化的科研中，实现对于人的培养和教化，这其实是现代研究型大学所面临的一个实质问题（李猛，2017）。

今天越发职业化、专业化的研究取向，使得这一教育的传统逐渐式微，几不可见。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了老板和雇工之间的职业关系。师生关系越冷漠，教育就越不可能。此外，当今大学教育的困难还在于学生受到整体趋势的影响太大，与学校教育处于比较分离的状态。各种系统对于生活世界的入侵，正逐步体现在大学教育的领域。各种留学申请、入学考试的准备原本是教育的一部分，而现在却越来越成为市场的产品。这是教育面临的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如何发挥塑造人的功效？

然而这既非学术传统长期以来的状态，亦非任何一种学科和学术的“正常状态”。就社会学而言，费先生说过，“社会学科研和教学，就是一个社会人文精神养成的一部分”（费孝通，2009b：438）；而一种将学术、教育与人结合在一起的现代大学，是“建设一个优质的现代社会所必不可少的”（费孝通，2009b：438）。在中国社会学的传统中，费先生和潘光旦先生的典故、吴文藻和吴门四犬（吴文藻先生十分重视学生的培养。他的四位弟子费孝通、林耀华、瞿同祖和黄迪因为同属狗，所以被冰心称为“吴门四犬”）的典故都已经成为佳话。这种对于学生的培养风气也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了下来。

正如前文所呈现的，师承关系所建立起来的文化和风气要落实于具体的人。通过一代又一代的人，逐渐形成和传承发扬传统而实现了整体教育。在今天，这仍然是对抗大学之中研究科层化和行政化、对抗各种学问之异化状态的

根本。只要有此种教育及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在，就不怕各种糟糕的趋势。费先生在《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与体会》一文中重点谈到，对于一个学科的建设和一个院系的建设来说，“知识分子的正气”是特别重要的东西。正气是一种道德力量和精神力量，是“一种精神”。费先生认为，这是他当年在“魁阁”时期主持工作的根本，也是西南联大的精神之所在，年轻一代的社会学人类学学者要开拓新局面，就必须要有这种“知识分子的正气”（费孝通，2009a: 468—469）。

事实上，这种风气和这样的人在社会学系和北大的教师群体中并不罕见。以杨老师为例，他的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那就是他会花大量的时间与学生谈话，在谈话中向学生传授治学心得、人生经验、各种知识等等。这种谈话在时间上远远超出了一位“职业化”老师的想象，真正具有某种传统意义上的“师徒”意味。每次他带学生外出调研时更是如此。现在他已经退休，不能再带研究生了，笔者让自己的学生跟着他从事调研活动。对于年轻的学生们来说，这是极为难得的学习机会。北大的学缘就是这样一代接一代地传承维系下去，不绝如缕。在生活上，杨老师堪称一个视学生如己出的好老师；在人生方向的选择上，杨老师更会站在学生的角度为之考虑。在2004年，笔者报考了杨老师的博士，同时也申请了国外的博士项目。次年春天，笔者考上了北大社会学系的博士，也拿到了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录取和资助，一时在二者之间无法取舍，因为杨老师特别希望笔者能够读他的博士，而笔者又觉得约克大学的“社会与政治思想项目”特别契合自己的兴趣。所以大约有一周的时间，笔者左右为难，不敢跟杨老师说这件事情。直到社会学系的研究生教务催促必须要做出决定，笔者才在第二天早晨给杨老师打了个电话，战战兢兢地说：“杨老师，我拿到了约克大学的 offer。”我迄今为止都还清楚地记得杨老师接下来说的每一个字。他说：“真是喜从天降啊！”

王炜老师也是如此。他对于笔者更为重要的影响当然也在书本之外。王老师同样视学生为自己的孩子，带学生读书，请学生吃饭，向学生讲述老一代学人如熊伟先生、洪谦先生的治学经验和处事风范。在正式的课程之外，他还

为学生开设读书会。读书会一般都设在晚上，从6点开始，一直读到12点之后。笔者迄今还清晰地记得，2004年冬天的某一次读书会，我们到凌晨3点结束时，发现外面下起了鹅毛般的大雪。笔者陪王老师回家，我们骑着自行车，穿过飘摇而落的纷纷大雪，从外哲所骑往蓝旗营的场景，历历在目。虽然笔者不是哲学系的学生，但是王老师没有任何门户之见，视笔者为私淑弟子，带到家里指导读书、做饭、教做翻译，带着逐字逐句校对硕士论文中关于海德格尔的部分。不仅如此，王老师对于学问也同样抱持着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一直到最后，他都在告诉笔者，一定不要放弃社会学中的田野调查和对社会的关注。他说，这是学问的根本。王老师2005年过世。我永远怀念他。

杨老师和王老师的教育，使笔者得以在接下来几年中安心在约克大学读书。幸运的是，笔者在约克大学的导师约翰·奥尼尔（John O’Neill）和王老师、杨老师对于学问、为人和教育有着几乎相同的理解。2018年，奥尼尔把他自己的弗洛伊德全集作为礼物寄给了笔者。在中国和在西方的共同经验让我确信，学问本身，是不分古今中西的。

七、结语

20年后的今天，笔者有幸在北大社会学系讲授“国外社会学学说”这门课，并逐渐按照自己的理解重返经典，同时在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下从事关于西方社会理论的研究，拓展中文学界的视野。与此同时，努力进入田野之中，不断磨砺自己对于中国社会自身的理解。既践行自己所理解的社会学，又努力拓展中国本土社会学的边界和传统。

笔者也会带着学生读海德格尔的书，讲着从王老师那里听来的关于老北大的典故和传统。要求学生，也要求自己，对学问抱持开放、包容、热情、敬畏和认真的态度；要求学生，也要求自己，在学习社会理论的同时要去进行社会调查，在经验研究之外也必须读书。笔者也会努力听取学生自己的研究兴趣，希望能够和学生一起学习，共同进步。这是笔者的北大学缘。北大于

笔者而言，就像水和鱼儿的关系。未名湖是一个海洋，你永远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但是也很确定，它会给你所需要的各种滋养、学问上的自由和生命里的归宿感。而这一切，都是通过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来实现的。在北大的这些年里，笔者在求学方面的缘分当然不仅与这些老先生有关，同时也与各个年龄层的学者密不可分。在这些年里，许多人与笔者亦师亦友，在学问、做人和生活方面所给予的关心、教育和照顾，使得笔者能够从各个方面逐渐认识到并努力克服自己的狭隘、自私和懦弱，逐渐在为人为学方面都成熟起来，做一个温和而又坚定的人。

笔者认为，对于任何一个院系来说，上述六个方面都堪称传统与传承之中最为宝贵的东西。也是笔者对于今天北大的教育仍然抱有信心的原因所在。教育在这个意义上，是整体的教育。北大之所以为北大，就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传统和文化。不过所有这些还是要落实在人的方面。如果老师们敏于行讷于言，做到“行为世范、学为人师”，那么学术传统的传承和“教以成人”的实现本该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今天的学者在日常工作中，越来越遭遇韦伯在“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这两篇演讲中提出的种种尖锐挑战，尤其体现在例行化、科层化的日常工作与反思这一工作和教育的意义之间的矛盾，然而恰恰是在这些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方面，才是将“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熔铸到一起的地方，也正蕴藏着教育的真义和可能性。

孙飞宇，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

原文载于《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公众号前沿学术信息。